

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初探研究

胡政源 嶺東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E-mail:jackson@mail.ltc.edu.tw

摘要

孔恩（Thomas S. Kuhn）標舉科學革命是專業信念之轉移的非常事件。科學革命產生，科學界研討的問題和革命前大不相同，使得教科書在許多基本的方向彷彿誤導了我們，每一場革命都使科學社群放棄一個由來已久的科學理論而採取一個與舊理論不相容的新理論。新制度經濟學(NI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目標若是科學革命，以創造一個的典範移轉，就得要進到某些尚未被探索的相關研究領域中。新制度經濟學確信，新古典經濟分析依賴高度特殊假定，如不經修正，則無法有效處理理論家、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注的許多問題；在交易成本、不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理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裡，要推導經濟解答的步驟，理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故在方法論觀點的轉向已出現關鍵性轉變（Critical transformation），動搖了經濟科學的傳統，並且結合既有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體系進行動態分析；逐步進行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尚處於粹鍊之中，已開創了各種次領域（sub fields）的研究；諸如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財產權分析（Property-rights analysis）、契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 of contracts）、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關係與不完全契約理論（Relational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科學革命、典範移轉

1.前言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家，將新古典模型推向其邏輯的終點，並指出其所創造世界的不合理之處，已對下一個世紀的經濟學家締造了無價的貢獻，而且他們已經設定好了研究議程，並在已經開始的議程上持續研究工作。在若干簡化的假定下，新古典理論主張的是一個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會達成一個該經濟體最佳的 Pareto 均衡，而市場可被解釋為達成生產與交換的一般均衡時邊際均等的制度性工具，故在新古典論述中，制度只是扮演消極的角色。其中，有許多新制度經濟學者體認到新古典分析的不合理假定，認為新古典分析有關交易不花成本、完全理性、充分知識的一些假定過於僵化，尤其是將制度視為既定的外生變數，或認為其對經濟事項沒有影響而加以忽略，已無法有效解決現實世界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故新古典經濟分析依賴高度特殊假定，如不經修正，已無法有效處理理論家、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注的許多問題；新制度經濟學者也確信，正統的新古典分析極為抽象，如不稍做修正，恐難有效處理許多理論家與政策決策者所關注的問題。在交易成本、不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理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裡，要推導經濟解答的步驟，理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所以，這些主張新制度主義者，乃試圖在正統的邊際主義之上，修正新古典分析的不合理假定，以便說明制度如何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新制度經濟學者認為交易成本因經濟活動而必然發生，並且在決定制度結構與人們所做的特殊經濟選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新制度經濟體以正交易成本與有限理性決策者為特徵，既不能達成新古典理論所承諾的理想效率結果，也不能達成藉由混合式模型所指的相對效率解答或受限的 Pareto 最適解答；(Kreps, 1990; Furubotn, 2000)。而在現有知識下，任何對新制度經濟學概念作數學處理的意圖，都得冒遺漏或掩蓋理論主要特徵的風險。而某些新制度經濟學者更指出經濟學是動態的，必須藉著演化的制度與價值體系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以及人們為什麼會儲蓄、投資、學習和創新等經濟活動 (Williamson, 1994)。

2.新制度經濟學之發展

2.1 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分野

從方法論的分類上，舊制度經濟學（OIE- 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自稱是規範性的經濟學，認為人應該有許多價值判斷標準存在，不僅是如主流經濟學學者認為是理性的而已；故不主張現今主流經濟學的實證（positive economics）觀點，而自認是一種規範性（normative）觀點的學派。事實上，舊制度經濟學雖然是規範性(normative)，但是他們自認追求的卻反而是實證(positive)的制度理論。主流經濟學所採取的常態科學探究途徑是從牛頓物理學的科學概念來研究經濟事務與行為，但是舊制度經濟學學者則是主張由達爾文的進化的觀點來看人類的經濟事務與行為；故舊制度經濟學對於量化研究的方法也就保持一定的距離，意圖從建構結構因素（包括歷史）的角度來詮釋真實世界所發生的經濟現象；新制度經濟學則試圖奠基於主流經濟學之上，進行組織經濟分析與發展制度理論；因此，制度經濟學的新舊之間的區隔可以說是一種經濟社會物理學研究與經濟社會生態學研究。對於人的基本假設，新、舊制度經濟學兩者具有有顯著的差異，舊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是多元化的，人類行為並不能由單一的理性假設來概括；舊制度經濟學基本上否定人是單純的理性，認為人是學習性的，不論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均會去學習。然而，由 North 所領軍的新制度經濟學，基本上並不排斥主流經濟學對於人類理性的假設，但調整為所謂「有限理性」的修正；新制度經濟學採取與主流經濟學共同的理性基本架構，發現舊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多元論於研究上是具有問題與困難，又為了連接主流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之理論，故採取折衷的有限理性假定。其次，新、舊制度經濟學另外一個重要差異，即新制度經濟學基本上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舊制度經濟學是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舊制度經濟學認為分析社會的現象一定要從社會的結構、社會的制度進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則由組織的個別成員進行制度經濟研究。

2.2 經濟學中新制度論的發展

時下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中皆產生不同種類的新制度論，彼此之間各據學術版圖卻又相互滋長，可見新制度論是一個快速成長中的學術領域（Thelen，1999）。其中，受經濟學影響（以理性選擇制度論為代表）與受社會學影響（以社會學制度論為代表）的兩大制度理論集團，植基於各自對其領域限制的自我批判，從各別方法論的角落出發，經過『制度』這個共通的媒介，一方面探索向來屬於對方所經營的研究領域，一方面也擴大自己新制度論集團的研究範疇（陳敦源，2002）。North(1989)對「制度」的定義，基本上包非正式約束(習慣)與正式規則(法律)，以及這兩者的執行特徵。儘管制度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制度設定了社會與特殊經濟的誘因結構，確能規範個人的行為，故為經濟能否發展的關鍵因素。新制度論中最核心的基本因果假設就是制度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或現象與結果（institution matters）（郭承天，2000）。至於運用不同研究途徑分析相同的研究議題，產生了不同的研究結論，也符合學術研究「百家爭鳴」的特性。

2.3 新制度經濟學的次領域

新古典經濟學提供其他學門(包括新制度經濟學)三個主要的研究內涵，也是相關社會科學研究中「經濟研究」的根源。其一，從理性自利假定出發的分析；其二，從資源分配的角度出發；其三，從演繹邏輯的思維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奠基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另由三種新的理論影響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分別是：(一)交易成本理論(二)財產權理論；(三)契約理論(含代理理論、關係契約理論)。由North所領軍的新制度經濟學（NIE），基本上並不排斥主流經濟學對於人類理性的假設，但修正成只接受所謂「有限理性」。新制度經濟學引介幾個重要的、且與新古典經濟學全然不同的基本假定：(1)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有關社會現象的理論，必須起始於且基於對個別成員的觀點與行為的闡釋。(2)效用極大化-個別決策者，無論其身份地位為何，被視為是在組織結構運行的限制下，作自我的選擇、追求自我的目

標。(3)有限理性-決策者並不具有超理性，因為他們並非無所不知，在處理訊息的過程中也有其實際困難，故於有限理性與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下，他們無法藉由完全契約來處理現實的複雜問題。(4)投機行爲-由於當事人雙方，無論是主理(委託)人或代理人可能是不誠實的、故意混淆是非，也就是存在著「狡詐地追求自利」的情形，加上事前要區分出投機者與非投機者的成本很高，故要簽訂無所不包的完全契約注定會失敗(Furuboth and Richter,2000)。新制度經濟學仍保留著理性選擇(rational-choice)的傳統，不過，它的理性選擇係指個人基於考量其行動與其它替代方案的成本效益後所作的決定，而非如新古典經濟學之理性的假設—狹義的自利、完全的資訊、以及定義清楚的偏好排列等。新制度經濟學探討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且昂貴的資訊、不確定性、以及更複雜的人性動機如公平與正義，當考慮這些不同的有關決策的假設時，制度的重要性就變的很明顯了。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之目的不祇在於解釋制度的決定因素與其發展，而且要評估制度所帶來的經濟效率與分配效果。

新制度經濟學碰觸到過去新古典經濟學一直不願碰觸的結構性議題，如制度、財產權、意識形態與國家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構成要素的分析方法，尙處於粹鍊過程之中，但如今已開創了各種次領域(subfields)之研究，此即現代制度經濟學(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這些次領域列示如下(Furuboth and Richter,2000)：

- 1.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主張交易成本的產生與交易過程息息相關，其數量多寡亦會影響經濟活動的組成與實行的方式。一般交易成本的分類，包括搜尋與訊息成本、談判與決策成本，以及監控與執行成本在內。而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別考量這些成本對契約形成的影響。此等範疇的貢獻者，包括 Coase, Williamson, Alchian, Klein, Demsetz 與 Barzel 等人。
- 2.財產權分析(Property-rights analysis)：主張在經濟體系中的財產權體制會界定出

個人使用稀有資源的定位 (position)。由於財產權配置會以一般可預測的方式影響經濟誘因與人類行為，故研究財產權安排對經濟產出衝擊的基礎已然存在。這個領域的貢獻包括 Coase, Alchian, DeAlessi, Furubotn 以及 Pejovich。

3. 契約經濟理論 (Economic theory of contracts)：契約屬相對財產權，契約為交易成本經濟學與財產權分析的「同系」(relative)，契約理論所處理的是誘因與不對稱訊息的問題。不對稱訊息可區分為兩類：即當事人彼此之間對於契約的訊息不對稱，以及契約當事人與第三者（如：法庭）之間的訊息不對稱。契約經濟理論植基於此，又詳細可予區別兩種不同類型的契約理論。

(1). 代理理論 (Agency theory) 係討論訂約當事人 (Contractual parties) 之間訊息不對稱的問題。而尚待深慮的訊息不對稱，可能存在於交易發生之前與以後。這些情況，新制度經濟學所採取理論探究途徑，大體上有賴於文辭分析 (verbal analysis) 或使用正式模型。有關文辭的 (實證的) 代理理論的貢獻者，包括 Jensen, Meckling, Fama, Alchian 以及 Shavell。

(2) 關係與不完整契約理論 (Relational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則側重在可能因訂定 (通常為長期) 契約當事人與第三者之間，所產生的訊息不對稱課題。此等契約主要目標在於克服訂約後的投機行為 (post contractual opportunism)。這可能係因法院或其他第三者，在面臨履行契約義務時舉證困難所肇致。在此一領域中，可靠的承諾與自動執行承諾 (self-enforcing commitment) 是重要的主題。關係契約理論的貢獻者，包括 Macaulay, Macneil, Goldberg, Williamson 與 Alchian 等人。Grossman 與 Hart 則對正式的不完整契約理論有所貢獻。Telser, Klein, Leffler 與 Kreps 則建立了自動執行契約較不正式的模型 (Furubotn and Richter, 2000)。

新制度經濟學係依據制度與組織之創設，以及其日常所需的實質資源投入等基礎洞察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交易成本和財產權結構的系統性考量與契約理論相互關係之經濟分析，呈現了現代制度思想的關鍵性發展，此係因一旦朝此方向移動，個體經濟理論就不再回歸到制度安排是對於經濟行為沒有獨立影響效果

的中立性要素的立場上；儘管如此，大多數 NIE 學者最初所採用的探究途徑，仍偏重依賴新古典的觀點，而有過度簡化問題以及常會將討論移往不具創作性方向的結果。因此，NIE 的分析對某些觀點雖有所助益，但仍會不經意的產生誤導，這種「擴充式新古典模型」(extended neoclassical model)的論述內容卻出現了至關緊要的難題。實際上，由於正的交易成本與有限理性的假定存在，NIE 體認到新制度探究途徑應該和新古典模型所採用的探究途徑有所不同，但是新古典模型仍被引介並被 NIE 研究工作所接受，只是加入並未發現的限制(Eggertsson,1990,6)。然而，事實上，如今 NIE 所採用具有極大影響結果的新假定，以及其對世界觀點的改變所隱含著其與早期 NIE 貢獻者所建立的簡單模型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換言之，當新制度經濟學派思想漸趨成熟，某些評論者便開始挑戰在方法論上與新古典正統方式有太大歧異的 NIE 研究成果。簡言之，由於交易成本被認定是存在的，故新古典的完全理性假定必需放棄，並且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來取代。而非零交易成本表示有限資源是生產與分配活動中的交易投入 (transaction inputs)，也是所有經濟操作運行範圍內，維繫基礎架構的必要因素。因而，資源的個別財產權之界定與形成，當然對社會所達成的經濟結果 (economic results) 有著直接的影響。

3 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

3.1 新制度經濟學的崛起

隨著近二、三十年來的發展，新制度經濟學(NI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已快速成爲研究領域的重要一環。這不僅是因爲有越來越多的文獻著重在探究組織經濟制度議題，試圖將財產權結構和交易成本如何影響經濟誘因與經濟行爲納入考量，以擴展新古典經濟理論的適用範圍；也因爲採取新制度經濟學探究途徑的幾位經濟學大師先後獲得 Nobel 經濟學獎，包括 1974 年得主 Friedrich von Hayek，1982 年得主 George J. Stigler，1986 年得主 James Buchanan，1991 年得主 Ronald Coase，

及 1993 年得主 Douglass North 等人；使得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可說是如日中天。如今，已有許多經濟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認為自己是 NIE 主題專家，而有關制度議題的理論性與實證性文獻，已明顯地與日俱增。呈現此種趨勢的徵兆，可從 1997 年在諾貝爾獎得主 R. Coase((1991)與 D. North(1993)的領導之下，成立的國際新制度經濟學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知其進展；這個學會試圖致力於交易成本、契約問題、政治的博奕規則、法律規則、財產權、政府國家、意識形態、文化議題等研究的人們，及對採用標準常態科學方法具有興趣的學者，齊聚一起進行研究(Furuboth and Richter, 2000，顏愛靜主譯，2001)。新制度經濟學者也確信，由於交易成本之故，新古典的完全理性假定必需放棄，並且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來取代。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分析極為抽象，如不稍做修正恐難有效處理許多務實的經濟理論家與政策決策者所關注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者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者忽視「制度」對於人們決策的限制，造成古典經濟學祇有理論而無制度；對於早期制度學派的偏重制度敘述而未建立制度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也試圖讓早期制度經濟學派同時擁有制度敘述與制度理論(Langlois,1986)。

3.2 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科學革命的啟發

為能從未來 NIE 如何發展的問題中獲得啟發，就有必要進一步察看現代經濟學早期論著所突顯的一些基本概念，在 1960 與 1970 年代間，此等領域的大多數貢獻者的意向，並不是要拒絕邊際主義，而是要擴充其範圍，他們對於標準新古典分析技術可以有利於應用到各種問題與新制度環境上頗具信心，這種變革性探索途徑日漸昌盛，重點是要理解，新古典模型的理性假設與基於最適化的數理推導過程可予以維持，但其餘則須修正，因此，其主張為 **1.**制度不再被視為對於經濟行為沒有顯著影響的中立性因素，**2.**財產權的存在類型超過一種以上，以及利潤或財富極大化並不能確保，**3.**經濟體系並不是一不無磨擦性的機器，交易成本隨著交換

過程而產生，且其數量大小將影響經濟活動的組成與實行的方式，**4.**分析的焦點應該集中在個別決策者，而不是組織或集體，個人有其不同的目標，但是每個人可視為在現有制度結構下，追求效用極大化。以上所論，特別著重在財產權安排與交易成本會影響個別誘因及爾後行為，就此狀態言，如果能對經濟活動所發生的制度環境加以確切詳述，則對行為的預測可增添其精確性。然而，並非所有新制度陣營的學者都認為，其研究方式和傳統理論之間有些關係，但是他們大多數都接受了新的想法與新古典模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的觀點，甚至有些人認為，個體經濟理論經適當的發展，這是一種財產權與交易成本探索途徑，然而他們的態度已隨時間有所改變了，今天對於這個基本課題的見解已少有一致了，儘管如此，這個「擴充模型」概念的支持者事實上仍佔其中的大多數。

3.3 新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觀點的轉向

新制度學派論著對交易成本和財產權結構的系統性考量，呈現了現代制度思想的關鍵性發展，並藉由擴充現有的新古典理論來發展分析架構的可行性。新制度經濟學發展之初，是維持新古典模型的理性假定與基於最適化的數理推導過程，其餘則酌加修正，其主張：**1.**制度並不是對經濟行為沒有顯著影響的中立性因素。**2.**財產權存在的類型眾多，並不能確保利潤或財富極大化。**3.**經濟體系並不是一部無摩擦性的機器。交易成本隨著交換過程而產生，且其數量大小將影響經濟活動的組成與實行的方式。**4.**分析的焦點應該集在個別決策者，而不是組織或集體。個人有其不同的目標，但是每個人都可視為在現有制度結構限制之下，追求效用極大化。基於此主張，新探究途徑的要件已經有所進展，且有必要界定特殊效用函數以便反映出決策者的偏好，並讓決策者決定真正的選擇集。基於這些要素，正式的問題便是，受制於所採的機會集（Opportunity Set）的限制，如何求取極大化效用函數（Furubotn and Pejovich 1972A, 138）。但不幸地，不管其所顯現的合理性為何，這種理論的處理仍有一些嚴重的缺陷。

部分新制度學者（如：Stiglitz 1985；及 Wiseman 1991）則認為，在交易成本、不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理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裡，要推導經濟決策的步驟，理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因此，他們嘗試對新古典主義的不同評價加以證明，但仍有部分問題尚待商榷：**1.矛盾的假定**：指新古典分析的假定有些被排除，有些仍然留存，使得新制度混合模型的論述結構產生了內部不一致性。**2.預測的正確性**：這種新探究途徑，隱含了一些成本難以納入混合模型中：恐會造成預測的偏誤。**3.最適化的成本**：包括決策方法成本、資料成本與選擇成本三種，但是並未完全納入新制度模型中。**4.無窮盡的迴歸（infinite regress）**：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存在的環境裡，理性選擇的概念會導致邏輯上的兩難，嚴謹的最適化理論的困境是「循環問題」，因為可完全納入決策成本加以解決的最適化問題並不存在（Winter 1975； Gottinger 1982； Conlisk 1988）。**5.經濟效率**：由於經濟效率只有在符合理想的 Pareto 最適化條件時才會存在，故在有限理性、正交易成本的世界裡，就不能直接從最適化問題求解的過程來解釋經濟行為，因而常見的效率基準（如福利邊界）也就消失殆盡。**6.活動的協調**：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問題的任何新結構要更具有洞察力，都必須呈現出不僅是新古典模型的擴充而已，而須由全新的理論來取而代之，但尚未成功。

3.4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科學典範移轉

有些經濟學家指出，近日以來新古典理論被人質疑的趨勢漸起，其主要原因並不在新制度學者及其他學者已提出對抗它之令人信服的論點，而是因為理論本身的技術發展對其限制做更深入且正確的研判。新古典理論，可予以一般化以消除一些侷限性，主要的步驟是終止消費者選擇理論與廠商理論的二分法，方法是藉由將效用極大化的假設擴充到所有的個人選擇之中，包括企業經理人與政府官員所做選擇的另個步驟是，將有關個人選擇的限制觀念，擴充到包括制度限制(財產權體系)，以及因其性質與現狀所加諸的更多限制，(例，包括交易與調整成本)。這

種情勢固然是事實，但也清楚顯示新制度學派質疑新古典模型的適當性而進一步提出強烈論證，很簡單的，要放鬆新古典理論若干高度特殊的假定而不去改變整個分析的特質顯然是不可行的，這問題不只市從真實世界引入複雜事務與保證得到不善盡美並且只有在純粹理論才能接近理想期望結果的一個問題，相反的，在交易成本不完全訊息以及有限理論扮演理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裡，要推導經濟決策的步驟是相當有別於新古典案例所料想的過程，因而，隨之而來，便是嘗試提出對新古典主義逆向判斷的證明，並解釋某些正統模型為何像是不能為處理制度問題提供適當基礎的主要理由。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新古典觀念的經濟問題已經起了根本性的改變，決策者發現他們自身並不像新古典模型所假定的「完全靈通的」(fully informed)那樣，反而是每個人面對選擇時只擁有部分的(partial)知識。換言之，再也不可能假定每個決策者對於既有的技術選擇、各種財貨的真正特性等，皆能有完全訊息；再者，每人的知識稟賦或訊息結構的確是有些不同的。個別決策者實際行為所採基準的主觀資料(subjective data)，與所謂經濟體系的客觀資料(objective data of the system)是有蠻大區別的。當然，後者只有透過決策者集體才有可能完全得知。一個另人滿意的新制度模型必須考慮制度安排及其對經濟行為的影響，而新制度理論的要論，必與正統新古典理論有明顯的不同。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清楚地突顯出最適化的問題，並在確的界定資料與體系的初始條件下，可達到求得 Pareto 最適解的目標。事實上，新古典理論每種必要條件在一開始均是已知的。然將比較性探究途徑應用到新制度問題中似乎是不可行的，其主要的不同在於後者存在著根本不可知的因素影響成果。何況在經濟體系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全盤了解其他決策者已經達成了什麼，因為所有的個人或多或少均是獨立的，且社會上也同時充斥著不確定性。所以，在形塑這些元素的清楚圖像過程中的不斷失敗，將會使新古典理論體系理論的發展變得更加困難。

孔恩 (Thomas S. Kuhn) (1962)於巨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標舉科學革命是專業信念之轉移的非常事件。科學革命產生，科學界研討的問題和革命前大不相同，使得教科書在許多基本的方向彷彿誤導了我們，每一場革命都使科學社群放棄一個由來已久的科學理論而採取一個與舊理論不相容的新理論。明顯的，如果經濟學典範的主要改變被認為隨時可能會發生，今天最值得探討的是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觀點是否呈現此種關鍵性的轉變，因此似乎有必要提出此一基本問題，特別是詳細的討論藉由擴充現有新古典理論來發展新制度經濟學的可能性，但至少已被理解是存在的。因此，一但體認到交易成本與財產權結構的差異會導向不同的經濟行為時，則較為容易的步驟是，將制度當做必須在標準新古典架構下嚴謹考慮的特殊限制。新制度經濟學(NI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目標若是科學革命，以創造一個的典範移轉，就得要進到某些尚未被探索的相關研究領域中。新制度經濟學確信，新古典經濟分析依賴高度特殊假定，如不經修正，則無法有效處理理論家、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注的許多問題；在交易成本、不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理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裡，要推導經濟決策的步驟，理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故在方法論觀點的轉向已出現關鍵性轉變 (Critical transformation)，動搖了經濟科學的傳統，並且結合既有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體系進行動態分析；逐步進行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

4. 結論

從前面的討論，可知新制度學派刻正持續發展之中，但也面臨如何決定這領域之未來發展的難題。有關新制度理論發展，應注意的是：**1.**新制度學者的論點仍相當不一，而至今該領域的界限也未明確建立；**2.**這個理論的進展，有絕大部分是經由各層次領域的創新工作來進行，如交易成本經濟學、財產權分析、法律與經濟學，比較體系與憲政經濟學等；**3.**直到現在，學者之間對於如何處理好經濟學上制度與組織問題的見解仍有顯著不同。儘管如此，大多數新制度學者確信正統新古典分

析所作的特殊假定，如不經某些修正，就無法有效處理理論家、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心的許多問題。但是我們應知道，確認新典範的可能需要是一回事，而真正建立一種內容豐富的新制度主義模型，則又是另一回事。如與新古典理論的一般均衡模型相比，新制度主義的目標若是創造一個典範移轉的「偉大的設計」(grand design)，就得要進到某些尚未被探索的相關研究領域中，並且結合既有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體系元素等進行動態分析，以進行經濟科學革命。是以，想要的全面發展的模型，恐怕在近期內不太可能出現。儘管如此，並非指新制度主義毫無進步，其實，這個學派對未來研究的實質基礎已經存在，而且其中有關契約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與廠商的經濟學等領域的某些議題已經顯現實質的發展。

總之，經濟學在近期內還不會很快地整合成新典範，但不可否認地，對正統經濟理論公式化不滿意的人正不斷地增加，而 NIE 也為經濟學注入一些重要的新觀念，正有待評估這些當代理論並整合這些基本的發現。本文嘗試對新制度學派的發展，界定關鍵性議題方面的進展提出連慣性的看法。我們可以合理的說，在專業方面已經學得足以建立未來工作的議程，而在早期有效性較低的新制度分析的觀念已經大有進展，但也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尚往研究解答。不論如何，NIE 探究途徑的新視野即將展現，理論的發展也很有希望，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看到許多更具影響力、更專門的新制度主義思潮的出現，而現在所累積的研究成果，正是未來新典範成功發展的重要基礎。

參考文獻

郭承天(2000)。〈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載於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頁 171-201。

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

Alchian, A. A.(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211-21

Alchian, A. A.(1965). "The Basis of Som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Management of the Firm.”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4:30-41.

Alchian, A.A.(1961).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AND D-2316.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Coase, R. H.(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Coase,R.H.(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386-405.

Coase, R. H.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0:229-31.

Commons. J. R. 1934.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Demsetz, H.(1967).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7:347-59.

Eggertsson, T. (1990).*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enhardt, K. M.(1989),”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pp.57-74.

Eucken, W.(1952). *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Edited by E. Eucken and K. P.Hensel. 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

Farnsworth, E.A.1990. *Contracts*. 2d ed.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Furuboth and Richter,(2000).*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制度與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 Eric G. Furubotn & Rudolf Richter 原著/顏愛靜(2001)主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Furubotn, E. G., and S. Pejovich.(197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Firm in a Socialist State: The Example of Yugoslavia.” *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30:431-54.

Furubotn, E. G., and S. Pejovich.(1972).”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Theory: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0:1137-62.

Goldberg, V.(1976). "Regulation and Administered Contract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7:426-52.

Grossman, S. J., and O. D. Hart.(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691- 719.

Hutchison, T. W. 1984. " Institutionalism Old and New."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0:20-29.

Jensen, M C., and W.H. Meckling.(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5-60
Reprinted in Putterman 1986a, 209-29.

Kreps,D.M. (1990). "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K. Alt and K. A.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90-14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glois, R. H.(1986).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R. H. Langlois, ed., *Economics as a Process: Essay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26.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neil, I. R. (1978). "Contracts: Adjustment of Long-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 Neo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2:854-905.

Macneil, I. R.(1980).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cneil, I. R.(1974). "The Many Futures of Contract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47:691-816.

Mattessich, P. W., & Monsey, B. R. (1992). *Collaboration: what makes it work. A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factors influencing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St. Paul, MN: Amherst H. Wilder Foundatio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90758).

North, D. C.(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trom, E.(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ntusson, J.(1995). "From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to Political Economy: Put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ir Places and Taking Interests Serious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8(1): 117-147.

Schmoller, G. von. (1990.)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Starr, J. A. and I. C. MacMillan.(1990). “Resource Cooptation via Social Contract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for New Ventur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79-92.

Thelen, K.(1999).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369-404.

Thomas 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Williamson, O. E.(1971).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61:112-23.

Williamson, O. E.(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Williamson, O. E.(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Winer, M., & Ray, K.(1994). Collaboration handbook: *Creating, sustaining, and enjoying the journey*. St. Paul, MN: Amherst H. Wilder Foundation.